

中国现代 文艺思潮论

支克坚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论

支克坚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政编码:730000

E-mail: press@lzu.edu.cn

<http://www.lzu.edu.cn/press/index.htm>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288千字 印数:1~1000册

ISBN7-311-01606-1/I·70 定价:18.00元

目 录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

- (1) 关于阿 Q 的“革命”问题
- (25) 《阿 Q 正传》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
- (48) 《呐喊》与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形成
- (58) 新文学史上鲁迅小说完成的历史使命
- (72) 为高水平的革命文学而斗争的伟大革命文学家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 (80) 一个被简单化了的主题
——关于鲁迅小说及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
- (99) 怎样读鲁迅写农民的小说
- (105) 一点想法
- (107) 论“为人生”的鲁迅小说
- (129) 鲁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中国化问题
- (146) “立人”与鲁迅精神
- 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
- (152) 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文学观念问题

- (188) 关于新文学发展中的“自我表现”问题
- (200) 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
- (207) 关于历史感
- (214) 中国现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主义主张
——冯雪峰文艺理论研究
- (239) 论“局限”及其他
- (246) 胡风与中国现代文艺主潮
- (271)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五四
新文化运动
- (290) 关于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论战
- (301) 今天研究现代文学的意义在哪里？
- (306)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 (329) 当前的文艺思潮与现代文学研究
- (334) 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 (365) 周扬身后
- (374) 后记

关于阿 Q 的“革命”问题

—

文学史上任何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独特的。他们的作品，自然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记，而且越是伟大的作家，作品中时代的印记就越深。但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又必定表现出作家认识生活的独到和艺术上的独创。这种独到和独创，是作家在一定的世界观指导之下，对生活和艺术严肃地、独立地进行思索的结果；它们使得一个作家跟别的作家相比，至少在某些方面更加深刻地反映着时代。因此，研究一个作家，应当注意他的独特。从这里入手，看看他在作品中，究竟揭示了哪些其他作家没有揭示的时代生活的本质的东西，提供了什么样的其他作家没有提供的艺术经验；一句话，对于时代，对于文艺，他作出了什么仅仅属于他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家。鲁迅伟大的一个方面，在于他起先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后来从共产主义者的立场，通过自己的作品，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并发展的时代，极其尖锐地提出了这个时代社会生活和革命中许多重大的带根本性的

问题。而这和他的独特是分不开的；离开了他的独特，我们不可能对他的作品的深刻有真正的正确的理解。以《阿Q正传》来说，这篇鲁迅最著名的小说，在辛亥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写落后、不觉悟的农民阿Q的悲剧命运。它由于比当时以及后来一些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更加深入地接触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问题的症结，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鲁迅在小说里，没有一般地来表现农民的苦难，表现自己的同情；跟别的一些作家不同，他根据自己对生活、对文艺的社会使命的独有的认识，集中描写了阿Q的落后和不觉悟，对阿Q的思想性格作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既批判和否定阿Q的不“革命”，又批判和否定阿Q的“革命”。从而把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小生产和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统治延续几千年所造成的最严重的恶果之一，摆在了读者面前；把近代和现代中国革命已经遇到并将继续遇到的严重的障碍之一，摆在了读者面前。

二

1936年，即《阿Q正传》发表之后15年，鲁迅在劝阻一位电影导演将它搬上银幕时说，对这篇小说的本意，“能了解者不多”^①。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几十年了，我们仍旧不能说已经了解了它的本意。问题正在于，许多研究者忽视鲁迅的独特，忽视鲁迅当时具体的思想观点和文艺观点在小说中的表现，仅仅一般地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来解释它，根据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路线来解释它。他们以为，非此不足以说明《阿Q正

^① 《致沈西苓》（1936年7月19日），见《鲁迅书信集》下卷。

传》的伟大，鲁迅的伟大。但像这样来解释《阿 Q 正传》，固然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鲁迅通过这篇小说表现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比如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和他明确地把农民问题同中国革命问题放到一起来考察，等等；却也免不了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与小说的实际相悖的结论。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许多同志对小说里阿 Q 的“革命”的解释。他们不认为阿 Q 的“革命”，不过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在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后换了一种表现的形式而已；鲁迅写阿 Q 的“革命”，如同他写阿 Q 的“精神胜利法”一样，是为了对阿 Q 的思想性格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他们认为阿 Q 的“革命”反映了被压迫农民向压迫者的反抗要求或革命要求，是鲁迅对农民革命性的发现和肯定；虽然大家都强调，这种革命要求还是自发的、朦胧的，还夹杂着许多荒谬的想法，但也已有人把阿 Q “造反了”的嚷嚷，称作时代的“强音”。与此相联系，这些同志又十分表面地把小说所总结的辛亥革命的教训，说成是它忽视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农民的力量，忽视了动员农民，等等。上述这些，近好些年来，几乎已成为研究者们大体一致的观点^①。

但把阿 Q 的“革命”，说成是鲁迅对农民革命性的发现和肯定，显然与鲁迅的本意不符。下面我们从鲁迅自己谈《阿 Q 正传》的许多话里，引出人们最熟悉的一段来：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 Q 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 Q 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 Q 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 Q 似的革命党出

^①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里不专门引述某一位同志的具体论点。

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以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 Q 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①

许多研究者喜欢引用这段话里前三句，来证明自己所持也是目前通行的观点。然而，如果不是孤立地来看这三句，而把它们和整段话联系起来，那就不应该怀疑，鲁迅对阿 Q 的“革命”和阿 Q 式“革命党”，采取的是明明白白的否定态度。第一，鲁迅“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透露出来的分明是一种悲哀，在悲哀背后的当然不是肯定而是否定。第二，鲁迅说“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 Q 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也不包含肯定的意思，而是对辛亥革命的讽刺，对阿 Q 的“革命”的讽刺；讽刺中同样透露着悲哀，悲哀的背后同样是否定。第三，鲁迅最后举出高长虹的例子，更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否定态度，这我们到后面再来论及。正因为鲁迅对革命前的阿 Q 采取了否定态度，对“革命”的阿 Q 一样采取了否定态度，他描写的阿 Q，其思想性格前后固然有所变化，却仍有根本的一致之点，并且恰恰是必须否定之点，所以，他才说阿 Q 前后“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可见，从这段话里单引前三句做正面的解释，是断章取义，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了鲁迅的原意。王西彦同志 1957 年指出过这一点^②，可惜至今未引起注意。

而尤其说明问题的，是埃德加·斯诺所记 30 年代鲁迅和他的一段对话。

① 《华盖集续编·〈阿 Q 正传的成因〉》。

② 见王西彦《论阿 Q 和他的悲剧》一文。

“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鲁迅说：“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

“既然国民党已进行了第二次革命了，”我向鲁迅问道：“难道你认为现在阿 Q 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

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①

30 年代“管理”着中国的是谁？是国民党新军阀。阿 Q 同国民党新军阀竟然能联系在一起，乍听起来十分离奇。从现象上看，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加以侮辱和损害的阿 Q，跟侮辱和损害了除他们自己之外所有中国人的国民党新军阀，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何况，阿 Q 又确确实实，已经由“神往”革命到“不准革命”，最后死在了辛亥革命后钻进政权机构来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屠刀之下。但鲁迅决非随意而谈。他所说的阿 Q，无疑仍旧是《阿 Q 正传》中的阿 Q，是《阿 Q 正传》问世之前，在他“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②的阿 Q。鲁迅把阿 Q 跟国民党新军阀联系在一起，也许可以理解为国民党新军阀身上也明显地存在着“精神胜利法”，但又的确另有深意，这我们也到后面再来论及。这里我们只先指出，鲁迅对阿 Q 的“革命”的彻底否定，至此已无须再来怀疑。

把阿 Q 的“革命”说成鲁迅对农民革命性的发现和肯定，也跟小说里的具体描写不符。试看鲁迅具体描写的阿 Q 设想的“革命”：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

^① 见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② 《华盖集续编·〈阿 Q 正传〉的成因》。

祠，叫道，“阿 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乌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 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 D 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 D 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这些想法，自然完完全全是阿 Q 式的，不仅幼稚可笑，而且荒唐透顶。但我们透过那种幼稚、荒唐的外表，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实际上，阿 Q 所想的（而且十分“严肃”、十分“认真”地想的），无非是两件事：对环境实行极其盲目的报复，和把赵太爷、赵秀才等的东西攫归己有。要说鲁迅从这里发现了农民的革命性，像这样肯定了农民的革命性，那是不可想象的。不！恰好相反，鲁迅在这里发现和指出的，是当时中国一部分农民同革命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驰的思想意识。而鲁迅对此所持的态度，当然是否定而不是肯定。

那么，鲁迅从阿 Q 的“革命”中，究竟发现了当时中国阿 Q 般的农民思想意识中什么必须予以批判和否定的东西呢？为了真正弄清这个问题，须得先弄清关于阿 Q “精神胜利法”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阿 Q “精神胜利法”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许多

鲁迅研究者把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称之为失败主义，指出它表现了弱者在强者面前无力作真正的反抗，进而根本不图作真正的反抗，只是盲目自大，自欺欺人，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实际上的失败。他们并且根据这样的认识，分析了“精神胜利法”产生的阶级根源。但这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认识，其实是表面的、似是而非的。因为，在《阿 Q 正传》里，阿 Q 诚然是个弱者，不断地受到以赵太爷为代表的强者的欺凌，连生计都几乎断绝；但对阿 Q 来说，向强者反抗，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因而在精神上取得什么反抗的“胜利”，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所以，这种认识，并未揭示出阿 Q “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有的研究者曾经指出，阿 Q “精神胜利法”的特点，是在他常常会设想自己也是处在压迫者、奴役者的地位上，设想自己也有力量和权利去压迫人、奴役人，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被压迫、被奴役者。应该说，只有这种看法，才是接触到阿 Q “精神胜利法”的实质的。事实是，尽管鲁迅在《阿 Q 正传》的开头，就用一段关于传的名目的“开心话”（在这段表面上的“开心话”里，鲁迅满怀悲愤地把自己替阿 Q 写的“传”，跟历史上所有替“阔人”、神仙写的“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区别开来），宣布他将以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对立为背景，写一个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历史；然而，读者往下读的时候，却很快就发现，这个被压迫、被奴役者——一个名叫阿 Q 的农民，根本不仇恨压迫者、奴役者，相反对压迫者、奴役者十分向往和倾慕。小说第二章里，鲁迅描写阿 Q 跟别人口角时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这里“阔”的含义，无疑是指和赵太爷、钱太爷一样有权势和钱财。接下来，鲁迅又描写阿 Q 见到赵太爷、钱太爷因儿子是“文童”而格外受人尊敬时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更直接表明他心目中“阔”的样板是未庄这两个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这种对压迫者、奴役者

的向往和倾慕，是阿 Q 思想性格的最根本的特点，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最根本的特点。阿 Q 这个特点，如果把他和鲁迅笔下其他但求安稳地活下去的农民（像《故乡》中的闰土和《祝福》中的祥林嫂）放在一起，是异常鲜明、异常突出的。而阿 Q “精神胜利法”的其他种种表现，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个特点有关。比如，他之所以诋谈自己的缺点，自然是因为那跟想象中自己的“阔人”身份不相称的缘故。再如，他之所以能够忘却屈辱，又是因为在想象中自己已经超出或高于别人。至于第三章里他欺侮静修庵的小尼姑，更说明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耍压迫者、奴役者的威风。所以，这个特点，是阿 Q 思想麻木或精神麻木的根子，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思想或精神的最大的麻木。说到这里，我们也就明白，阿 Q “精神胜利法”的实质，并非什么不能在实际上只能在精神上反抗压迫者、奴役者，不能在实际上只能在精神上取得这种反抗的胜利；而是不能在实际上只能在精神上爬到压迫者、奴役者的地位，使自己变成压迫者、奴役者，取得这样的所谓“胜利”。

第二个问题：阿 Q 身上产生这种“精神胜利法”，原因究竟是什么？许多研究者简单地判定“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进而把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说成是农民受统治阶级思想毒害的产物。他们举出许多例子，说明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堕落的中國上流社会怎样到处弥漫着“精神胜利法”。他们还从理论上论证了当时发生这种情况的必然性，以及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被统治阶级的必然性。如果仅仅看到阿 Q “精神胜利法”的形式，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进一步看到第一个问题所说的实质，再简单地把它产生归因于统治阶级的影响，就未必能够说服人了，因为它分明本来就是一种跟阿 Q 被压迫、被奴役的身份和地位不可分开的东西。也有同志对此提

出过不同的看法，比如，何其芳同志在《论阿 Q》^①一文中，认为：

象阿 Q 那样的劳动人民，除了劳动力而外一无所有，本来是没有忌讳自己的弱点的必要的。然而当他还不觉悟的时候，他不能不带有保守性和落后性，而这种保守和落后也就不能不阻碍他去正视、承认和克服他的弱点，而且用可笑的方法来加以掩饰了。这就是说，在人民的落后部分中间也可以产生阿 Q 精神的。

虽然何其芳同志没有把问题深入下去，而且他这篇文章乃至上面引的这段话，还有不少看法值得讨论，但无论如何，他指出阿 Q 的“精神胜利法”产生在阿 Q 这样的农民身上有其内部的根据，非常重要。仔细读一读《阿 Q 正传》，读一读鲁迅关于《阿 Q 正传》所说的话，我们应当承认，鲁迅自己，是并不把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简单地算到统治阶级的帐上的。鲁迅在小说的第四章，明确地写到阿 Q 的某些思想来自统治阶级，例如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等等；但对于阿 Q 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从未有过这方面的无论是明白的还是含蓄的描写。值得注意的，倒是鲁迅在《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的话：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正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

^① 见 1956 年年 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

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鲁迅这段话说得非常清楚，他写《阿 Q 正传》，是为了在充斥着“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的中国，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鲁迅终于把它画出来了，这便是阿 Q 的魂灵。也就是说，阿 Q 的思想性格，他的“精神胜利法”，不管怎样地应该批判和否定，却不是“圣人之徒”的东西，而属于“沉默的国民”。

中国沉默了几千年的国民的魂灵何以如此不堪呢？换一句话说来，像阿 Q 这样的农民，不是统治阶级的影响，又怎么会产生“精神胜利法”呢？其实，只要我们真正认识了阿 Q “精神胜利法”的实质，那么，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再从历史看中国当时的现实，我们就不会再怀疑，这种“精神胜利法”产生在阿 Q 这样的农民身上，的确确实有其内部的根据。列宁说过：“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闭塞性就愈

加厉害。”^① 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又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始终是一个小生产像汪洋大海的国家，一个封建宗法制度绝对统治的国家，一个极其闭塞的国家。小生产者本来就是私有者，他们的眼光不能不受到私有制极大的限制；而一向紧紧伴随着小生产的封建宗法制度和闭塞性，更严重地阻碍了他们政治思想的发展。因此，尽管历史上农民不甘忍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一次又一次起来反抗，在斗争中，先进的农民针对着封建社会各个领域的不平等受到强烈憎恨的情况，提出过“平等”的革命口号，但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平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农民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局限性。至于那些落后的农民，则集中地反映了小生产的局限性。他们中间有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起来同压迫者作斗争，并不做改变自己命运的尝试。他们中间更有一些人，对压迫者毫无仇恨，只有向往和倾慕，其理想是升入压迫者的行列，或者由自己取原来的压迫者而代之。上述情况，一直继续到辛亥革命前后，因为直到此时为止，中国的农民并未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而阿 Q 作为辛亥革命时期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他的思想性格，他的“精神胜利法”，正反映着上述两种落后农民中后一种的思想特征。当然，在精神上变自己为压迫者、奴役者，在精神上取得这方面的“胜利”，是阿 Q 的一大发明。阿 Q 会有这样的发明，是因为他处在一种非常尖锐、非常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对压迫者、奴役者的向往和倾慕是如此强烈，已经达到难以改变的地步；另一方面，他又是如此怯弱，以致不可能采取任何足以使自己向着压迫者、奴役者的地位上升的实际步骤。他的“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矛盾得不到解决的结果；而鲁迅也正是通过描写这种矛盾，既突出地表现他思想的前一方面，又突出地表现他思想的后一方面。无论前一

^①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76 页。

方面还是后一方面，其根源都在小生产固有的局限，都在小生产、封建宗法统治以及闭塞性所造成的农民政治思想的不发展。对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封建宗法统治和闭塞性，鲁迅在《阿Q正传》里，通过未庄这个典型环境，作了非常深刻的描写。作为绝对的宗法统治的一个例子，鲁迅在小说第一章特意描写了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情节，而阿Q从此便无姓。此外，鲁迅又通过一些似乎是无意写来——其实是有意写来，因而可算是神来之笔——的细节，从大小各方面表现了未庄的极端闭塞：大者如第七章里，未庄传说革命党进城时“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小者如第二章里阿Q嘲笑的未庄人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前面说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能简单地判定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简单地算到统治阶级的帐上；但是，从不是别人而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整个地造成了产生阿Q“精神胜利法”的环境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笔帐最终还是要向他们去算的。

三

在弄清了上面两个关于阿Q“精神胜利法”的问题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弄清楚鲁迅从阿Q的“革命”中，究竟发现了什么必须批判和否定的东西了。我们知道，阿Q的“革命”，是辛亥革命从他身上呼唤出来的东西。问题是在于辛亥革命究竟在阿Q的思想上增添了什么新因素，又取掉了什么旧因素呢？没有，什么也没有！在先，他以“精神胜利法”表明了自己的落后，表明了小生产的局限；如今，他又以他那种“革命”，再一次地（虽然是用另一种方式）表明了这一点。许多研究者认为，辛亥革命造成的县里的白举人和未庄的赵太爷等人的惊慌，使得阿Q一改向来对革命的态度，由“深恶而痛绝之”变为“神往”，乃是阿Q心底里虽处于休眠状态却并未完全死灭的反抗意识，在

革命到来时终于觉醒过来的标志。这其实是皮相之谈。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学家，严格的现实主义者，性格描写的大师，鲁迅在他的每一篇小说里，描写任何一个人物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是遵循着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的。他对阿 Q 的描写更不例外。从阿 Q 的性格逻辑来说，这个人物由“深恶”革命到“神往”革命，有其必然性。首先是他关注革命有必然性。因为，他不像闰土只求维持眼前充满艰难和困苦的生活，只求日子不要变得更坏；他的思想特点，是强烈地向往和倾慕压迫者、奴役者。这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思想在实际上常常是“不安分”的，因而当环境发生变动的时候，他不可能远远躲开；革命是件大事，他更不可能远远躲开。其次是他“神往”革命有必然性，但这恰恰不是因为革命向他灌输了什么新思想，相反地是由于，按照他的理解，革命为他打开了如下的前景，就是多年来只能在精神上“实现”的某种愿望，“达到”的某种目标，将在生活里真正实现和达到，“精神胜利”要变成实际的胜利了。阿 Q 的理解，自然是误解，他看到白举人以及既包括赵太爷父子、又包括王胡和小 D 的“未庄一群鸟男女”的惊慌，误认为革命一来，他过去的一切仇（其中确有真正的阶级仇，可惜阿 Q 并无认识）都可以报了，赵太爷在未庄的统治地位，将由他来代替了。我们前面引过的阿 Q 关于革命的那番设想，便是因这种误解而来的。它的基本内容，如前所说，一是盲目报复，一是攫取财物；而其中所表现的思想，跟阿 Q 以前通过“精神胜利法”表现的思想毫无二致，根本特点是对压迫者、奴隶者的向往和倾慕，以及由自己代替他们的愿望。你要具体地了解阿 Q 在他的“精神胜利法”里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吗？请看他设想的“革命”吧！然而，对阿 Q 来说，这却是他全部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除此之外，他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抱负，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的抱负等等，就“全被一笔勾销了”。应该说，阿 Q 的眼光所